

图书发行中等专业统编教材

新华书店总店主编

古旧书发行基础知识

郑宝瑞 等编著

中国书店

前 言

为贯彻江泽民总书记发出的“整理出版古籍,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的指示精神^①,适应教学、培训和自学的需要,图书发行中专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织编辑了《古旧书发行基础知识》。

本书叙述了我国古旧书的历史和现状、性质、方针、任务,介绍了古籍版本常识、版本鉴别以及古书装订修补知识,对古旧书的收购、销售和企业管理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和理论概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标志着我国古籍整理研究出版事业进入繁荣时期,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兴盛的表现。作为一个反映人类文化历程、文明建设成果窗口的古旧书业,也作出了积极贡献。

本书是委托中国书店在历次古籍研究班和学习班讲稿的基础上编写的。《绪论》和《古籍版本常识》由中国书店原总经理郑宝瑞编写,《古籍版本鉴别》是根据苏州古籍书店江澄波的同名讲稿加工整理而成,《古书装订修补》是根据中国书店王志鹏的同名讲稿加工整理而成,《古旧书的拍卖》是根据中国书店副总经理恩亚立和拍卖公司经理彭震尧的《浅析古籍书刊资料拍卖》思路而成。全书由郑宝瑞总纂。编写大纲得到图书发行中等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汪轶千和副主任委员郑士德的审阅和修改。初稿脱稿

^① 1992年5月22日,江泽民总书记给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的题词。

后,中国书店总经理沈望舒和中国书店出版社社长马建农分别进行了审读并提出不少宝贵意见。

本书的编写,得到中国书店及其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他们组织老发行工作者参加本书编写,多次讨论编写大纲,并提供诸多参考资料。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深致谢意。

图书发行中等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

1999年10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我国古旧书业的历史	(1)
一、书肆的兴起和槐市的出现	(1)
二、唐宋辽金时期的坊间刻书	(2)
三、元明书坊	(4)
四、清代的书业和民国年间的古旧书店	(6)
五、建国后的古旧书业	(10)
六、古旧书业的功绩	(13)
第二节 我国古旧书业的现状	(18)
一、我国古旧书业的现状令人忧虑	(18)
二、古旧书业严重萎缩的原因	(19)
第三节 古旧书业的地位和作用	(20)
一、古旧书业的地位	(20)
二、古旧书业的作用	(21)
第四节 社会主义古旧书业的性质、方针和任务	(23)
一、社会主义古旧书业的性质	(23)
二、社会主义古旧书业的方针	(25)
三、古旧书业的任务	(27)
第五节 国家对古旧书业的政策与管理	(29)
一、关于古籍出口的政策	(30)
二、关于开展古旧书刊收售业务和加强对古旧 书业的领导管理	(30)

三、关于古旧书业减免税的政策规定	(33)
四、关于稳定和建设古旧书业队伍的政策和 具体做法	(33)
第二章 古籍版本常识	(36)
第一节 古籍版本的涵义和名称	(36)
一、古籍版本的涵义	(36)
二、古籍版本的名称	(38)
第二节 古籍版本款识	(49)
一、行款和版框	(49)
二、栏线和书口	(50)
三、其他标志	(51)
第三章 古籍版本鉴别	(55)
第一节 鉴别版本的方法	(55)
一、根据牌记鉴别版本	(56)
二、根据原书序跋鉴别版本	(57)
三、根据后人题跋识语鉴别版本	(58)
四、根据书中避讳字鉴别版本	(59)
五、根据行款和刻工鉴别版本	(66)
六、根据书名冠词鉴别版本	(66)
七、根据各种著录鉴别版本	(67)
八、根据藏书印记鉴别版本	(68)
九、根据各朝代版刻特点鉴别版本	(69)
第二节 活字本与版刻本的区分以及校抄本的鉴别	(73)
一、活字本的特征	(74)
二、鉴别校抄本的方法	(75)
三、清代著名校勘学家	(79)

第三节 区分丛书本与单刻本	(80)
一、根据校刻人姓名款式来区分	(81)
二、根据其他特点来区分	(81)
第四节 区分刻印本与石印本、影印本	(83)
一、印版的形式	(83)
二、区分刻印本与石印本、影印本的方法	(84)
第五节 鉴别古籍版本应具备的知识和注意事项	(85)
一、鉴别古籍版本应具备的知识	(85)
二、鉴别古籍版本的顺序和注意事项	(87)
第四章 古旧书收购、销售和古旧书店企业管理	(90)
第一节 古旧书收购	(90)
一、收购员基本条件	(91)
二、收购作用	(92)
三、收购范围	(94)
四、收购方式	(94)
五、收购手续	(96)
第二节 古旧书销售	(97)
一、古旧书销售要领	(97)
二、销售方式	(101)
三、珍稀古旧书刊专场拍卖	(103)
四、正确处理销售中的几个关系	(113)
第三节 古旧书店的管理	(115)
一、对回收古旧书的审查	(115)
二、古旧书的价格管理	(116)
三、古旧书店的商品管理	(117)
第五章 古书装订修补	(120)

第一节 我国书籍装订的起源、发展以及古籍装	
修常用名词·····	(120)
一、我国书籍装订的起源和发展·····	(120)
二、古籍装修常用名词·····	(125)
第二节 古籍装修的工具和材料·····	(126)
一、装订修补古籍必备的工具·····	(126)
二、修补古籍常用材料·····	(128)
第三节 装订修补方法·····	(130)
一、装订方法·····	(131)
二、修补方法·····	(134)
第六章 古旧书发行队伍建设·····	(142)
第一节 古旧书发行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及培训	
队伍的形式·····	(142)
一、古旧书发行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	(143)
二、培训队伍的形式·····	(144)
第二节 古旧书发行人员的职业道德修养·····	(146)
一、热爱本职勤奋工作·····	(147)
二、注重效果,提高发行质量·····	(147)
三、满足需要,尽职尽责·····	(147)
四、关心读者,恪守信誉·····	(148)
五、礼貌待人,文明服务·····	(148)

第 一 章

绪 论

古旧书发行工作承担着发掘、保护、流通古籍文献,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回收再发行各类旧书刊,最大限度地实现书刊使用价值,节约社会财富,满足读者需要的任务。它和新书发行工作有共同之处,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国家制订了对古旧书业的特殊政策。

第一节 我国古旧书业的历史

一、书肆的兴起和槐市的出现

我国古代的书店称书肆,还称书坊、书林、书铺、书堂、书棚、经籍铺,也有称书屋、精舍、山房的。

据郑士德著《图书发行学概论》:“我国图书发行事业产生于西汉景帝时期(公元前 156 年~前 141 年)。《汉书》卷五十三《河南献王传》载:‘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秦旧书,多奉以进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这是我国史书上最早记载的图书买卖活动。时间是在公元前 150 年左右(汉景帝时期),购书人是河间献王刘德,用高价向民间收买先秦古籍。由于给价高,有些人不远千里奔赴河间,把冒着生命危险珍藏多年的先秦旧书卖给刘德。于此同时,淮南王

刘安也出重金向民间收买图书，供门下学者集体编写《淮南子》做参考。

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市场上出现了图书交易。武帝后期至元帝初期(公元前100年~前40年)，在长安市上出现了专以售书为业的书肆。

公元4年，我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书籍集市。这已到了西汉末期，朝廷的大权掌握在王莽手里。他为了笼络士子，在长安东南郊大兴土木，扩建太学，能容纳‘博士弟子万八百人’，在太学附近‘列数百行为队’的槐树林里，设立了书籍集市，史称槐市，每半月一次。买卖书籍的双方，主要是太学生。他们把自己读过的经传书籍卖给同学，同时也出售笙磬乐器或从家乡带来的其他产品。买卖双方的文化素质都比较高，文质彬彬，注重礼貌，轻声轻语地介绍书籍内容，有时还在槐树林里展开学术讨论。这个槐市约持续了10多年，在历史上很有名。

东汉定都洛阳。朝廷重建太学，学生多达3万余人。许多名人学者聚集洛阳。洛阳城内设有3个市，商业较为繁荣。这些有利条件，促成了书肆的恢复和发展。书肆经营的图书品种开始增多，众流百家的著作都能让读者自由翻阅”。^①

二、唐宋辽金时期的坊间刻书

约在7世纪末8世纪初，我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有了印本书。在今四川、江苏、浙江、安徽、陕西、河南等地，书肆已很普遍。唐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元稹所作《白氏长庆集序》自注曰：“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唐柳玭《柳氏家训》序云：“中和三年癸卯(公元883年)夏，銓與在蜀之三年也。

^① 《图书发行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有的经营好的书肆，还载入了史籍。唐《尚书故实》云：“京师书肆孙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鉴书画，精于品目，豪家所宝，多经其手，真伪无所逃焉。”可见他的专业知识水平很高。

公元960年，宋朝结束了混战割据的局面，雕版印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宋版书以雕印精良著称于世。宋代书店集中的地方主要是建阳和临安（今杭州）。建阳地处闽北山区，当时由于战火频仍，文人避此者较多，当地又产纸，故成为著名的刻书中心，历经宋、元、明数代。明嘉靖版《建阳县志》云：“书籍出麻沙、崇化两坊，昔号‘图书之府’”、“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据《建阳县志》所载，书坊乡（即崇化坊）刻印书目有451种之多。南宋著名学者朱熹《建阳县学藏书记》云：“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说明当年这里的书坊业很繁荣。建阳书坊最盛时约有40多家，其中著名的书铺有万卷堂、勤有堂、翠岩精舍、南涧书堂、宗文堂、日新堂、务本堂、忠正堂、清白堂、诚德堂、三台馆、双峰堂等。有的书铺历史较长，如：余氏勤有堂由宋至明，历经三代，郑氏宗文堂有近300年，刘氏日新堂有192年，刘氏翠岩精舍有156年的历史。

临安是南宋首都，文化艺术繁荣，是书坊集中地之一，可考的书坊有20家，其中著名者有：荣六郎书籍铺（随宋高宗赵构南迁而来的书铺）、尹家书籍铺、棚北大街睦亲坊陈宅书籍铺等。陈宅书籍铺主人陈起，字宗之，号芸居，与一些文人多有诗书往来。陈起之子续芸，继承父业，也刻印了一些书籍。宋代的书坊，除建阳、临安外，从所刻书籍传本和各家书目著录中可知，在四川有西蜀崔氏书肆，在陕西有咸阳书隐斋，在山西有汾阳博济堂等。

辽代统治阶级提倡学习中原地区汉族文化。辽代出版中心在南京(或称燕京,即今北京)。除官刻外,也出现了私人书坊。润农等写的《北京古旧书业与北京文化发展》云:据苏辙《论北朝事谊札子》记载:“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朝无所不有。臣等初到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章传语臣辙云:‘令兄内翰(谓臣兄轼)《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访闻此等文字贩虏中,其利十倍。”然而,仅仅靠从外地贩书到燕京,仍无法满足燕京文化发展的需要,一些书肆便开始刻印汉文书籍。据《澠水燕谈录》记载:北宋张芸叟出使辽朝时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首,谓之《大苏集》。”范阳辽属南京析津府,今河北涿县。

金代刻书业中心在平阳,又称平水(即今山西临汾)。北宋东京汴梁陷落,宋高宗南渡迁都临安,汴梁书铺,一部分南迁临安,一部分北迁平阳。平阳造纸业比较发达,故成为北方刻书中心。平阳书坊不少,如:平水中和轩王宅,平阳晦明轩张宅,平阳李子文,书轩陈氏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苏联政府赠还我国的《刘知远诸宫调》,就是金代平阳坊刻本。

三、元明书坊

元代书坊刻书之盛,超过宋代,其原因正如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所说:“盖世愈近则传本多,利愈厚则业者众。”刻书比较集中的地区,仍是宋代的浙、蜀、闽和金代的平水。叶氏列举元代书坊有36家。余志安勤有堂、虞平斋务本堂、刘锦文日新堂是建阳著名的书肆。建安叶日增广勤堂刻书最多,有些板片得自建安余氏,改用“广勤堂新刊”木记。元朝统一中国后,定都北京,称元大都,北京的书肆有所发展。陈高华著《元大都》一书中说:高丽的使臣曾在大都的书肆中购到《三国志评话》、《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

西游记》等书。燕山窦氏活济堂是专门刻印售卖医书的书店。据《析津志》记载，大都城内的省前东街还出现了“文籍市”，文人学士购书不必再各处搜求，形成了有固定场所的图书市场。

明朝建立以后，封建专制统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随着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书肆业逐步繁荣兴旺。明代初期，书坊仍集中在建阳、杭州和四川。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后，北京成了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书肆逐步发展。嘉靖以后，金陵（今江苏南京）、苏州的书肆也盛极一时。

明代建阳书坊，有的自宋经元，至明不衰。金陵为明初首都，文化发达，加之徽州、湖州等地很多刻工移向金陵，因而刻书工艺得到很大发展。金陵著名的书坊有唐对溪富春堂等93家，多集中在三山街一带。他们大多以刻印戏曲小说和民间应用类书为主，不少版画出自名工之手，刻工极巧，十分精美。明代北京书肆，据胡应麟《少宝山房笔丛》记载：“多在大明门之右，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约有13家，远不如南京、建阳之多，著名的有：北京永顺堂、国子监前赵铺、正阳门内大街东下小石桥第一巷内金台岳家书坊，正阳门内西第一巡更铺对门金台汪谅书铺等。永顺堂在成化七年至十四年（1471年～1478年）刻印有说唱词话和南戏《白兔记》，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明代唱本。金台岳家书坊于弘治戊午（1498年）冬重刊印行《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该书全书传世者，当以此本为最古。金台汪谅书铺嘉靖元年（1522年）依宋元版翻刻《史记》，十分精致，它是当时北京一家规模相当可观的书铺，约刻印了14种书。《少宝山房笔丛》还记载：“明代刻书之地有三：浙江、江苏、福建”，同时还提到：“聚书之地有四：北京、南京、苏州、杭州。”说明在明代已有些书店专营发行而不刻书，出版和发行已开始有了分工。

苏州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因苏州有金门、阊门，合称金阊，故书坊多冠以“金阊”二字。金阊书坊虽不及建阳、金陵之多，然据张秀民先生考证有 37 家，所刻以小说为多。1957 年北京来薰阁曾收到金阊书林舒载阳刻《封神演义》一部，国内罕见，日本内阁文库存有一部。金阊叶敬池书种堂刊有《醒世恒言》、《新列国志》。金阊叶敬溪亦刊《醒世恒言》，图极精。有的书店如振业堂、书业堂，清初继续营业，席氏扫叶山房直至民国仍在上海营业。

明代杭州书坊，据张秀民先生考证有 24 家，刻书最多的是胡文焕文会堂，约刻 450 种。

四、清代的书业和民国年间的古旧书店

清代书坊以北京为最多，其次是苏州，再次是广州。南京、杭州书坊的数量远不及明代。嘉庆间，建安麻沙镇一场大火，使几百年的老书坊，连同旧有板片全部烧毁，此后未再恢复。清代的书店比明代更加普遍，在大城镇都有了书店或书籍摊贩。

明代北京书肆，多在棋盘街一带，以及贡院考场前面、灯市、城隍庙等地方。到了清初，改在广安门内慈仁寺（今报国寺）。清初王渔洋在他的《池北偶谈》等书中常有他在慈仁寺购书情况的记载。如：“官都二十余载，俸钱之入，尽以买书。尝冬日过慈仁寺市，见孔安国《尚书大传》，朱子《三礼经传通解》，荀悦、袁宏《汉纪》，欲购之。翌日侵晨往索，已为他人所有。归来招怅不可释，病卧旬日始起。”他又在《古夫于亭杂录》中说过：“昔在京师，士人有数谒予，而不获一见，以告徐尚书健庵（乾学），徐笑谓之曰：‘此易耳，但值每月三五于慈仁寺书摊候之，必相见矣。’如其言果然。”到乾隆年间，慈仁寺受到地震的破坏，荒凉不堪，书市转到和平门外琉璃厂，很快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街。

琉璃厂之所以发展成为文化街，与当时一些汉官文人住在这

一带有关。如：孙承泽住在厂甸附近，其宅第和花园被称为孙公园，至今琉璃厂南还有前、后孙公园胡同；王士禛住在火神庙夹道；孙星衍在乾隆年间住在琉璃厂夹道（今万源夹道）；李渔在韩家潭建了一座庭院；《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纪晓岚的阅微草堂就在琉璃厂南的虎坊桥。此外，琉璃厂附近有许多会馆，投宿者除商人外，多为赶考举子和进京候补的官员，这都促进了书业的发展。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李文藻写《琉璃厂书肆记》。清末缪荃孙写《琉璃厂书肆续记》。今人孙殿起写《琉璃厂书肆三记》，雷梦水写《琉璃厂书肆四记》。缪、孙、雷他们分别记述了自同治丁卯（1867年）到清末，以及民国到1966年前琉璃厂书肆发展变迁情况。琉璃厂和海王村自乾嘉以下，即成为文人学士流连忘返之地。道光前后，方朔《金台游学草·厂肆篇》作了这样的描述：“都门当岁首，街衢多寂静，惟琉璃厂二里长，终朝车马时驰骋。厂东门，秦碑汉贴如云屯，厂西门书籍笈素家家新。”可见当时琉璃厂文化街繁荣景象。不少文人写文作诗记述他们访书和有关情况。著名版本学家、藏书家黄丕烈诗云：“琉璃厂里两书淫，茆友茆翁是素心，我羨小琅环福地，子孙世守到于今。”黄晚年自称茆翁，这首诗是写给他的朋友张燮的。茆友是张的号，小琅环福地是张的藏书室名。嘉庆间，潘际云写有如下诗句：“细雨无尘驾小车，厂桥东畔晚行徐，奚童私向舆夫语，莫典春衣又买书”（《清芬堂集》卷十二）。许韵兰在回贵州前写有这样的诗句：“厂桥游趁上春初，囊有余钱尽买书。归压轻舟应胜石，伴郎披读快何如”（《听春楼稿》卷三）。

北京的古书店大多设在琉璃厂海王村一带，约有40家，但也还有设在隆福寺街的，其他地方为数不多。

民国时期，随着现代出版物的发展，旧书业兴起。北京的旧书店大多集中在东安市场中的丹桂、桂铭、中华商场、畅观楼和西单

商场的二场、三场。东西两场旧书店鳞次栉比,各有特色,吸引了不少读者。最多时北京有近二三百家古旧书店,规模较大的是文奎堂、来薰阁、遂雅斋、富晋书社、修绠堂等,专营旧书的有春明书店、中原书店、文光书局等。名气最大的是来薰阁。该店于清咸丰年间开业,当初以收售古琴为主,光绪年间租与他人。1912年由店主后代陈连彬收回,匾额仍题来薰阁琴书处。后由其侄陈杭(济川)为店主,他业务熟练,经营有方,因而该店业务蒸蒸日上,发展为私改前北京最大的古书店。来薰阁联系了一大批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为他们提供了不少图书资料。像郑振铎、魏建功、老舍、向达、傅惜华、赵万里、胡厚宣、吴晓铃等,和来薰阁关系都很密切。

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后,郑振铎遭日伪当局搜捕,常在来薰阁上海分店“避风”。郑先生对古书中的戏曲、小说、弹词、宝卷,尤其是附有插图的古籍特别喜好。1942年,来薰阁上海分店收到一部《太音大全集》,明正德、嘉靖间刻本,附精图百余幅。郑得知大喜,立即赶到该店看书。他当时收入菲薄,生活困难,但是看到这类好书还是想尽力购买,正如他在《劫中得书记》中所说:“力所不及,则缩衣节食以赴之,或举债以偿之,或售去他书以易之。”《太音大全集》终于为其购去,建国后,该书被收入《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第五函中。

陈杭和北京大学已故著名教授魏建功的交往更深。抗战前,魏在朝鲜留学,他和夫人王碧书的来往信件,都由来薰阁收转。抗战胜利后,魏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碧书携子女由重庆去台湾,路过上海,适逢中秋佳节,苦于经济拮据,来薰阁及时送去面粉、猪肉和钱,王碧书有说不尽的感激之情。1980年春,魏建功逝世。临终前,他把子女叫到床前说:“你们以后可不能忘记来薰阁书店同事们和陈杭一家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们很

大的帮助。”陈杭不仅在国内广交书友，还和日本、朝鲜的一些著名学者有着密切的交往。1928年至1930年间，他曾应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泽规矩也等人的邀请，先后四次东渡日本，在东京、京都、大阪、神户、九州、福冈等地展销中国古籍，并结识了日本专营古籍的文求堂、临川书店、汇文堂等书店，访问了不少日本学者，参观了一些图书馆。

上海是近代南方书业的中心。光绪前后，上海新开设不少书店。石印书局，有点石斋、同文书局、扫叶山房、斐英馆、有正书局、锦章图书局等50多家。铅印书局，有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图书集成局、广百宋斋、神州国光社等20多家。早在明朝万历年间，苏州洞庭山席氏就在苏州开设了扫叶山房。咸丰时，在上海彩衣街设立分号，后在棋盘街设北号。随着业务的发展，棋盘街的北号成为总店。迁沪后，石印出版书籍多至419种，有《四史合刻》、《百子全书》、《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历代诗文集、词集、词话、传奇小说等。同文书局于光绪七年（1881年）创立，备有石印机12部，共有职工500人，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先后出版发行《康熙字典》、《子史精华》、《御批通鉴辑览》、《佩文斋书画谱》等55种图书，其中最大工程为翻印《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

上海的古书店，还有陈立炎的古书流通处、柳蓉青的博古斋、罗振常与金颂卿合伙经营的食旧廬以及二人分立后的蟬隱庐和中国书店、郭石祺的汉学书店等。上海辟为商埠后，有些外省古书店也陆续来沪设店，如苏州的来青阁书庄在上海设分店，北京的文友堂在沪开设忠厚书庄，北京的来薰阁、富晋书社、修文堂、修绠堂也纷纷在上海开设分店（修绠堂分店叫温知书店）。这几家书店的从业人员，后来有的脱离原店另行开业，又派生出几家书店，如文海书店、艺林书店、萃古斋等。杭州的抱经堂书局也于1938年到上

海设分店。据 1948 年 8 月 15 日上海市图书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录记载,当时上海共有古书店 18 家,有的店没有登记,实际上达 20 多家。此外还有一些小本经营的旧书店、旧书摊,也兼营古书。上海古旧书业大多集中在棋盘街一带,几乎可同北京琉璃厂文化街媲美。上海古书业中最有名气的是来青阁书庄,店主杨寿祺精通古籍目录学和版本学,热心为读者服务,得到学术界好评。该店曾收购到明刊白棉纸《兰桥玉杵记》,郑振铎获知,立即赶去,细阅后购走。郑振铎曾说:“余于来青阁收得明刊戏曲最多,战后半载间,寿祺凡有所得必归之余。”上海沦陷期间,日军在苏州河四川路桥上站岗,过桥的人都要下车向日本兵鞠躬,否则就要挨耳光。杨老先生为了不向日本人行礼,八年中宁可不做生意也不肯过桥,这一民族气节,曾在书业界传为佳话。

清代直到民国年间,杭州、苏州仍设有不少古旧书店,杭州有抱经堂、文元堂、松泉阁等;苏州有古书店(包括旧书摊、书船友)不下 37 家,文学山房等经营时间最长。此外,其他城市也有古旧书店。天津有宝林堂、文韵堂、藻玉堂、宏远堂、茹香阁、直隶书局等,劝业场中的旧书店、旧书摊,也有相当规模。成都的学道街、卧龙桥、青石桥的书业颇负盛名,如尚友堂、九思堂、志古堂、点石斋、二西山房、存古书局等。济南有聚文斋等。沈阳有萃文斋、东来阁等。广州文德路、南京夫子庙一带,以及西安碑林附近也都是一些古旧书店。据不完全统计,在建国初期,北京约有古旧书店 111 家,上海约有 130 家,天津约有 74 家,广州约有 20 余家,武汉约有 40 余家,苏州约有 30 余家。

五、建国后的古旧书业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政治腐败,经济萧条,通货膨胀,文化落后,古旧书业很不景气,到新中国